

# 晋国始封地研究述论<sup>\*</sup>

马保春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市 100089)

**关键词:** 晋国; 始封地; 古唐国; 唐叔虞; 晋文化考古

**摘要:** 传世文献及后世学者有关晋始封地的记载、论说, 观点纷呈, 至清际大体上定格于翼城说与晋阳说之争。近代考古学的兴起, 为晋始封地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考古材料, 天马-曲村遗址、翼城南梁故城遗址、浮山桥北先族墓葬等的发现和发掘, 以及甲骨文《唐子爵》、《文王玉环》、《晋公盃》、《叔矢方鼎》、《覲公簋》等相关铭文研究的深入, 无疑是目前讨论晋始封地的有力素材。

**Key Words:** Jin State; early fief; Ancient Tang State; Tang Shuyu; archaeology of the Jin Culture

**Abstract:** There was wide division of opinions on the early Jin State fief in handed down literal records and among later scholars, which was roughly concluded in Qing times to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heory of Yicheng and that of Jinyang. The rise of modern archaeology provided interest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is problem, such as that from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the Tianma-qucun Site, Southern Liang City-site in Yicheng and ancient tombs at Qiaobei in Fushan, as well as the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and the Tang Zi *ju*e tri-legged cup, Wen Wang jade ring, Jin Gong *dian* basin, Shu Zhe tetrapod and 覲 Gong *gui* food container. These data are undoubtedly forceful evidence in the present discussion of the early Jin State fief.

文献所见有关晋始封地地望的观点有大夏(夏虚)说<sup>[1]</sup>、居鄂(鄂地)说<sup>[2]</sup>、晋阳说<sup>[3]</sup>、河汾之东说<sup>[4]</sup>、平阳说<sup>[5]</sup>、永安说<sup>[6]</sup>、翼城说<sup>[7]</sup>等。近代以来, 除一些学者继续坚持最有影响的翼城说<sup>[8]</sup>和晋阳说<sup>[9]</sup>外, 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开展, 有的研究者早已将文献记载和渐次出土的考古资料相结合,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 又提出了多种新说。如永济说<sup>[10]</sup>、夏县(安邑)说<sup>[11]</sup>、翼城南梁故城一带说<sup>[12]</sup>、襄汾汾城说<sup>[13]</sup>、汾浍之交一带说<sup>[14]</sup>、晋阳翼城并存说<sup>[15]</sup>、翼城、曲沃、闻喜一带说<sup>[16]</sup>、平阳翼城取其一说<sup>[17]</sup>、天马-曲村遗址附近说<sup>[18]</sup>等。这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在相关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推动下, 关于晋始封地的问题出现了两个讨论热点, 其

一是围绕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展开的讨论; 其二是根据出土及部分传世古文字资料中有关古唐国的信息来推定晋初封地。

## 一、考古学界围绕天马-曲村遗址的讨论

1962年, 国家文物局谢元璐先生首次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 1963年秋,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sup>[19]</sup>。从1979年至2000年, 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勘查和发掘。该遗址由翼城的天马、曲沃的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镇组成, 遗址面积约1000余万平方米。遗址主要为晋国墓地, 由北赵晋国公墓和遗址西南部的邦墓组成, 其中公墓区发现了晋国早期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墓葬19座, 学术意义最

<sup>\*</sup>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77105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A770036)。

为重要。

1993年12月12日,李伯谦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晋国始封地考略》一文,主张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也就是春秋时期屡见于传的晋都翼<sup>[20]</sup>。后来,李先生又写了《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一文重新肯定了上述观点<sup>[21]</sup>。

1994年初,邹衡先生发表了《论早期晋都》一文,认为天马-曲村遗址为唐,即晋始封地,亦故绛,南梁故城遗址为翼<sup>[22]</sup>。不久,邹先生又发表了《晋始封地考略》一文<sup>[23]</sup>,该文将晋侯始封地圈定在“翼城县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河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以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广约15公里的长形地带”,并认为“在此范围之内大概也就是晋始封地的中心所在”<sup>[24]</sup>。这是将天马-曲村遗址视为叔虞初封地的坚决论断。后来,邹先生又发表了《晋国早期都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及其学术意义》,认为“不管怎样,这(天马-曲村遗址,引者)是晋侯墓地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是早期晋都也是没有问题的”<sup>[25]</sup>。

刘绪先生同意上述观点,但就天马-曲村遗址作为晋侯墓地的年代下限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即穆侯或仍有迁降之举<sup>[26]</sup>。

1994年,田建文先生《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一文对天马-曲村是叔虞始封地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将天马-曲村遗址作为“故绛”有可商之处:(1)晋侯墓地在天马-曲村遗址中部偏北,城中有大型王陵现象见于战国,西周时见否?末代四世晋公陵墓在新田之西南15千米处的新绛县柳泉村南坡地上发现,并未设于绛中反与绛相距不近。曲村晋侯墓地之于故绛,是否亦类?(2)天马-曲村遗址属西周早期的遗存面积并不大,与都城相称乎?(3)天马-曲村遗址至今未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

(宫殿)基址。

该文又指出,唐地的范围可确定在今翼城、曲沃一带,但作为晋始都的唐并未找到,甚至连线索也没有,因为周之唐(晋)是对殷商之唐的取代,若是唐邑或晋都必须具有殷墟及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

所以,田建文先生认为通过两条途径可能找到晋始封的唐地:其一,继续在天马-曲村遗址范围内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古工作;其二,扩大调查范围,处于唐地范围内的绛山、塔儿山山前或山间类于梁、崤、塬、堡的地带是首选之地,唐邑或晋始封地的位置也许恰在其中<sup>[27]</sup>。

对于田建文先生的意见,徐天进先生认为不无道理。“但根据已有的诸多发现来看,晋国的早期都城即或不在现知的遗址范围之内,却也决不会相距过远。晋国始封地范围的确定是天马-曲村遗址20多年考古工作的最大贡献之一。”<sup>[28]</sup>看来,徐先生支持邹衡先生的意见。

1998年,在如何认识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问题上,谢尧亭先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认识:天马-曲村遗址可能是翼都或早于翼都的另外一个都城,非故绛;唐叔之封应有都城,可能在翼或早于翼的另一都<sup>[29]</sup>。看来,谢先生倾向于天马-曲村遗址是翼都或早于翼都的另外一个都的意见,但不能确定它就是唐,所以在北赵晋侯墓地所在之都与晋始封地的关系上,谢先生没有下结论。

陶正刚先生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研究发现“晋国早期都城‘唐’应该是在天马-曲村遗址附近。霍山以南的洪洞、临汾、翼城、曲沃、新绛等地,应该是唐国的疆域,这和《史记·晋世家》‘封唐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记载也是吻合的。”<sup>[30]</sup>陶先生这里给出了古唐国的疆域范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2003年,王立新先生撰文指出:将天

马-曲村遗址指认为故绛、翼以及始封之唐，似乎都有难解之处。因为据《左传·庄公二十六年》，“夏，土蒞城绛，以深其宫”。天马-曲村遗址周围应该有筑城的遗迹，可是，除在该遗址南缘的毛张村附近发现一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城外，未发现丝毫春秋城的迹象。王先生又指出：晋侯墓地中发现有穆侯的墓，并不能用以证明穆侯不曾迁都，原因即是周代贵族中曾有一种“反葬”（或称为归葬）的习俗，如《逸周书·作洛解》“武王既归，十二月崩镐，殁于歧周”；《礼记·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sup>[31]</sup>。

确定穆侯曾迁都是可以的，但究其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抑或穆侯所迁之绛离北赵晋侯墓地不远，是归祖坟同葬的行为。歧至镐、营丘至镐的距离都远大于绛（虽不确定，但离墓地不会太远，不出曲、翼二县）与北赵晋侯墓地的距离，故前者可以成为归葬，而居绛之晋穆侯入葬北赵晋侯墓地，就不便于称归葬。

王立新先生还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尚未确定宫殿、庙宇等重要遗迹的所在及其兴废过程；而且该遗址在晋文化之前，只发现了仰韶、龙山、东下冯型二里头文化三个时期的堆积，没有商文化的线索，所以很难确定它就是叔虞初封的唐地，将晋初封之地指定为这一地域，从考古学上使得唐人（或唐国）的文化无从着落。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因为没有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因而不可能是唐地，王立新先生将寻找唐地的目光投向了有此期遗存的临汾地区。因为临汾大苏村曾发现过年代相当于“大司空村早期”的遗存，临汾盆地南缘的浮山县桥北遗址近年也发现过殷墟二期前后的遗存<sup>[32]</sup>，洪洞县东北的坊堆村和永凝东堡一带发现了相当于殷墟四期及西周时期的遗存，有墓葬和铜器群，还有刻字的卜骨。依照文献记载，霍、杨、贾等小国存在于临

汾盆地，而叔虞所封的唐完全可能和其他小国并存。

那么，天马-曲村遗址应该是什么性质的遗存呢？王立新先生怀疑它可能就是叔虞之子燹父所徙晋水旁的所在，也就是晋国和晋侯之所以名晋的由来，在燹父迁于此之前可能是早期晋国疆域内的重要据点或附属于晋国的附庸国<sup>[33]</sup>。从2000年晋侯墓地发现的M114和M113为燹父及其夫人墓的推断来看，王先生的这个意见似可成立。这是对天马-曲村遗址为晋初封地唐的最有力否定。看来围绕天马-曲村遗址来讨论晋初封地，学者们的意见还很不一。

目前，如果天马-曲村遗址作为晋始封地的观点不能成立，那么，其内部的北赵晋侯墓地，也只能是一处晋侯墓地而已，我们并不一定要把它和晋国的某一都城划等号。（1）晋国后期的都城新田和柳泉墓地相距约12.5千米；（2）今曲沃、翼城境内有可能的几个晋都所在地与北赵晋侯墓地的距离不是太远（北赵墓地距苇沟-北寿古城约12.5千米，距南梁古城约17.5千米，距安鹤村约17.5千米）。有鉴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在此范围内，不管是生活在哪个晋都的晋侯，都可能以入葬先祖兆域的理由葬于北赵晋侯墓地。因此，不能在晋侯墓地发现某位晋侯的墓，就轻易判断为这位晋侯不曾迁都。

## 二、从出土及传世古文字资料 讨论晋始封地

叔虞封唐之唐，可能既是国名，又是都邑名，则其受封之地很可能就是古唐国之都城，因此，找到了唐城，就找到了晋始封地。考古工作深入开展以来，学者们试图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中有关古唐国的信息来讨论晋始封地的问题。古文字资料中有关唐地的信息，较早的当数殷墟卜辞中的“唐”。

卜辞云：

贞：并（作）大邑于唐土  
《金璋》611（《英藏》1105正）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  
《乙》570（《合集》14200）

贞：帝秩唐邑。  
《乙》700（《合集》14208）

贞：侑于唐。

贞：使人往于唐。  
《合集》5544

…唐告曰：吕方…于穹。

亦翦 [秩咎] …申亦有来自西…  
《续存》下297（《合集》39495）

辛卯卜，…方其出…唐。

《甲》2924（《合集》6715）

辛卯卜，贞：方不出于唐。

《录》705（《合集》6716）

另外，唐方还向商王进贡物品，卜辞云：

唐来四十。  
《合集》5776反

卜辞中的“唐”，是什么性质的地名以及它的地望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先生认为上引《甲》2924和《录》705等武丁卜辞中的“唐”，“据《左传》昭元年大夏、唐是晋叔虞的封地，定四称之为夏虚，《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今安邑一带。”<sup>[34]</sup>将唐定在安邑一带，可能是受唐与大夏关系的影响。其实，大夏当是一个较大区域的名称，而卜辞之唐，可能所指区域较小，范围较小的唐也许在作为区域名称的大夏之内某个地方。且安邑一带只在河东，而于汾则在其南，不合《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的说法。

学者对卜辞《金璋》611“作大邑于唐土”之“唐土”与文献中“唐杜”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孙诒让<sup>[35]</sup>、丁山<sup>[36]</sup>、李学勤<sup>[37]</sup>诸位先生认为卜辞“唐土”当为文献《国语·晋语八》、《史记·秦本纪》之“荡社”，或作“荡杜”、“汤杜”，它们实

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唐杜”，即范宣子追溯其先祖在周代为“唐杜氏”者。这就与晚殷的唐地有了关系，因为唐杜是唐尧之后裔。关于荡社的地理位置，李学勤先生从孙诒让之说，定在杜陵（今西安市东南），并认为近年于西安东郊发现的老牛坡遗址，在杜陵一带范围内，商代在唐杜作大邑，很可能和这里有关。

但是“唐杜氏”是在周初成王灭唐而迁其民于杜陵一带才出现的，这比卜辞中的“唐土”要晚，且卜辞中另外有杜字作“𠄎”<sup>[38]</sup>。所以置卜辞“唐土”之“唐”于晋南今翼城、曲沃、襄汾、浮山一带较妥。2000年，张永山先生《卜辞中的唐与唐尧故地》一文认为卜辞之唐与传说及文献中的唐尧之唐位于同一地域，他依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的说法，把这个唐地定在翼城县西10千米。张先生还指出它原本不是帝尧的活动中心，只是尧所辖的地域，继尧而起的首领舜或禹之流把尧的嫡宗封于唐，所以才有（《都城记》，引者）“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另外，该文把卜辞“唐土”之“土”也释读为“社”，但不再与“唐”联起来理解为“唐社”或“唐杜”，而是“唐”为唐邑、“土”为立社于唐邑的意思。全辞讲在唐地建一个大的邑落，并且立社<sup>[39]</sup>。

郑杰祥先生也认为见于一、二期卜辞的唐地当《史记·晋世家》“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之唐，其地望就是《大清一统志·山西平阳府》古迹条下之“唐城”所在，在今翼城县南<sup>[40]</sup>。

沈建华先生《甲骨文所见晋南方国考》一文根据以下卜辞：

…自崆友唐，吕方𠄎翦咎示易。

戊申亦有来艰自西，告牛家…

《遗珠》1182（《合集》6063）

癸卯卜…旬亡 [田]。王曰：有咎，陪隹其有 [来艰]。

四日丙午允有来艰…友唐告𠄎方臨入于𠄎。 《补编》1767

…来艰，自豈友唐… 《东京》388

…卜，𠄎贞：王獸（兽）唐，若。

…𠄎方其大 [出]，王国曰，𠄎 [方]… 《合集》10998 反

…午卜，争 [贞]…𠄎方…马…于唐。 《合集》8588

首先指出卜辞证明了商代唐地的确实存在。卜辞当中唐字除一部分为汤（大乙）借字外，余均为地名或邑名或侯名。唐近于邛（𠄎）方，唐地建有“大邑”、城墉及社，说明唐国的势力和规模非同一般小国。唐与商的关系，既有从属的一面，又有敌对的一面。武丁时期，唐臣服于商，商末周初，唐为晋南服属商人的顽固势力，直至为周成王所灭。唐与豈、𠄎同版，可知两地相距不远。𠄎方为公认殷西北之敌方，其地在晋北。唐地既近𠄎方，其国又为商服属之国，亦为商王田猎之所，则其位置当在𠄎方与殷商之间，据此可证唐地在今晋南汾浍之间（临汾至翼城）一带较为可信<sup>[41]</sup>。

1998~2002年，山西省浮山县桥北墓地多座殷墟时期铜器墓被盗，临汾市公安局缴获有8件带“先”字铭文的铜觚。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殷墟时期5座带墓道的方国首领级大型墓和殷墟至西周中期的十余座中、小型墓。甲骨文中有“先”方，卜辞云：

丙寅卜，争贞：呼𠄎先侯专杀𠄎。

《丙》1（《合集》6834）

可以说，浮山县桥北晚殷“先”族墓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晋南、晋西南晚殷卜辞地理的支点。后来，田建文先生认为桥北“先”族墓地可能就是商代晚期“先”方的所在，并从考古学上讨论了“先”与“唐”的关系<sup>[42]</sup>，认为若唐与先为一体，是先氏建立的唐国，还是唐还有个

吞并先的过程，或唐国由若干“氏”组成，先氏只是其中之一？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话，桥北以其规模当为唐侯墓地；若不然唐（子）与先（侯）是两个相互为邻的国家<sup>[43]</sup>。

看来，田先生对“先”与“唐”的关系还持谨慎态度。稍后田先生又指出：“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现在我们认为唐地就在浮山一带，以后才向南发展，这里对晋文化的构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44]</sup>

据清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先、范同祖”<sup>[45]</sup>，及《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国语·晋语八》可知晋之范氏又是唐人的后代，称范者，乃在晋世食邑于范之故，其族人食邑于随，又称随会者，所以，唐和先也是同祖的。又由于甲骨文中有“唐”、“先”同版的例子<sup>[46]</sup>，说明至迟在商代晚期有共同祖先的“先”和“唐”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方国了。

考古发掘证明“先”地在今山西浮山先桥北一带是没有问题的。按照田建文先生的意见，先、唐既然相邻，则寻找唐地的范围就扩大到今浮山桥北一带的周围，其南、其北、其东、其西都有可能了。今天马—曲村遗址所在的曲沃、翼城两县之地大体上位于其南，所以，此前一些学者关于叔虞始封地在天马—曲村遗址近旁的意见是符合浮山桥北“先”族墓地的考古发现的。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而浮山桥北以东、以北、以西都是古唐国有可能的所在，我们期待者考古工作的开展。

从地理形势上看，桥北遗址位于塔儿山东北乌岭山山前黄土丘陵地区，其周围，北部是今古县、洪洞县，地貌类型与其相似；其西为临汾县，即塔儿山以北的中、西部地区，地形也是山前坡地；其南为翼城、曲沃两县，这些地区都是古唐国有可能的地方。这种地形正和唐晓峰先生通过甲骨卜辞认识的唐地环境相合，卜辞云：

…卜，𠄎贞：𠄎（圉）…在唐录（麓）。二告 《合集》8015

…卜，…呼…先…录九月在唐。

《合集》14370 丁

…卜，𠄎贞：王獸（狩）唐，若。

《合集》10998 反

唐晓峰先生指出：录（麓）往往指山麓地带，唐地当有山岭，所以也称“唐麓”；圉可释作农田<sup>[47]</sup>，所以唐地当有农田。结合《尚书序》所说“唐叔得禾”一事来看，唐地有农田当不会错<sup>[48]</sup>。唐地既位于有山岭的山麓地带，其周围又有农田，那么，最有可能的地貌类型就是山间盆地了。

今虽在天马—曲村遗址中找到了晋侯墓地，但考虑到第二代晋侯燹父曾有南徙之举，则叔虞初封的唐地或在天马—曲村遗址以北的某个山间盆地。从地质地貌上看，临汾盆地东部西佐隆起以东的浮山小地堑盆地北部，曾发现过晚商时期的“先”方墓地，唐地很可能与这个盆地有关，而流经该盆地的今响水河中、上游地区值得注意。

《山西通志·金石记》著录了一件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其铭曰“唐子且（祖）乙”<sup>[49]</sup>，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认为其为“商代唐君之器也”<sup>[50]</sup>。由此可管窥商末古唐国之国势。

晋侯墓地 M31（晋献侯夫人墓）出土了一件玉环<sup>[51]</sup>。环的一面刻有文字一行，共 12 字，李学勤先生考释为：“文王卜曰：我及唐人弘战贾人。”<sup>[52]</sup>这里的“我”是周人，“唐”即成王封晋前的唐人。《左传》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杜注：“荀、贾皆国名。”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六：“贾，出自姬姓，晋唐叔虞少子公明，周康王封之于贾，为附庸，谓之贾伯，河东临汾县贾乡即其地也。曲沃武公取晋，并贾国，以其子孙为大夫。”贾国之所在，《春秋左传注》以为在山西襄汾东<sup>[53]</sup>。

李学勤先生指出：“周文王会合在这里的唐人，与在其北面不远的贾人作战，地理方位十分自然。假如唐在今太原一带，那就难以想象了。这件玉环乃是晋国初封位置的重要证据。”此玉环上的文字可能为唐人所刻。文王与唐人结盟战贾人，以玉环献神，此环留在唐地，“至周公灭唐，成王以其地封晋，这件玉环便归晋公室所有，直至献侯夫人卒时之用之殉葬。”<sup>[54]</sup>可见，在西周立国之际，古唐国曾与周人联合作战，这为其后来归顺周王朝不无关系。江林昌先生也认为，文王玉环的出土为夏墟、唐风、晋都地望的认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字证据<sup>[55]</sup>。

事实上，与周文王联合作战的唐，也不一定就只能在贾之南，只要唐在贾的近旁，就可以形成与周文王联手的可能，所以贾国的周围又是确定唐地的一个地理支点。如果我们和前文所推想的浮山“先”族墓地的地理支点相结合，则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即唐、贾相近，唐、先相邻的双重标准）的地区，就非常有可能是唐地之所在。今浮山小地堑盆地南部和临汾贾乡及襄汾一线之东的临汾、浮山两县交界地区十分值得注意。

另外，传世《晋公盥》<sup>[56]</sup>铭云：“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命唐公，□宅京自……”郭沫若认为此器为晋定公午所作，（唐）公为晋之始祖而“左右武王”，自即唐叔虞也<sup>[57]</sup>。既称叔虞为唐公，则说明他确实被封于唐地。近年来，出土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 M114 的“叔矢方鼎”更能说明这个问题<sup>[58]</sup>。鼎铭云：“在成周……彝<sup>[59]</sup>叔矢以衿衣、车马、贝卅朋。”李学勤先生以为“彝”字从“爵”省，齐声，当释为“倂”，读“斋”。《说文》：“斋，持遣也。”叔矢方鼎的器主是晋人，所以王也赐予舆服贝币，送之返国<sup>[60]</sup>。而王辉先生认为，“本铭中，叔虞身份还是‘士’，其名前未加唐字，则其时叔虞尚未受封。铭又称虞为‘叔’而不称

‘子’，则器也不会作于武王时期。”<sup>[61]</sup>那么，这件方鼎出土于燹父墓 M114 的事实，说明，该方鼎是还未受封于唐地的叔虞在周王朝所作之器，后因封分而被携带至唐，再传于第二代晋君燹父。

叔虞被封于唐地后，其后似又迁于晋。朱凤瀚先生《颀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介绍并讨论了香港私人所藏的颀公簋，簋铭有“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sup>[62]</sup>之句。由此可见，叔虞初封于唐地，为伯爵，“晋公盨”“我皇祖唐公”有美夸之嫌。燹父自唐迁于晋，方始称侯。唐和晋是两个不同的城邑。由此看来，叔虞确初封于与先、贾相近的唐地。

[1] 左传·昭公元年·中华书局标点本。

[2] 世本·居篇·宋忠注；史记·晋世家“晋唐叔虞者”下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之说。

[3] a.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下班固自注。

b.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六·毛诗音义上·唐宋注疏十三经·毛诗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143。

c.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四十·洪北江主编，乐天文丛书，第46册·据嘉庆十六年刻本·洪氏出版社，民国70（1981）：1675~1677。

[4] 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a. 晋·皇甫谧撰，清·宋翔凤，钱保塘辑，刘晓东校点·帝王世纪·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2。

b. 宋·郑樵·通志·都邑略之“周诸侯都”·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通志第一册·1935：554。

[6] 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下颜师古注引臣瓚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师古曰：“瓚说是也。”

[7] a. 唐·李泰·括地志·史记·晋世家“唐有乱”下正义所引。

b.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二（1983）。

[8] a.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册·1935：89~90。

b. 刘起钎·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古史

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37~138。

c.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历史研究，1959.（9）。

d. 程发轫·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上海：广文书局，1967。

e. 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f. 王志华·姬虞·三晋一百名人评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g. 日·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李广洁，谢鸿喜译，辛德勇校·山西古迹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39。

[9] a.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4~135。

b. 晓山·唐叔虞封地问题的商讨·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126~142。

c. 张亦彭·晋祠文物辨证·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

d. 张友椿·唐叔虞始封的所在·晋阳学刊，1983，（2）：78~79。

e. 孟繁仁·太原史话·序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f. 王增斌·唐叔虞封地考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6~49。

[10] 马斗全·唐叔虞封地在今永济考·晋阳学刊，1982，（4）：41~43。

[11] a.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1972。

b. 童书业·晋公盨铭“□宅京自”解·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62：81~83。

[12]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5~20。

需要说明的是，在2000年9月，曲沃又有两座晋侯墓（后来的编号为M113、M114）被盗，后来经抢救发掘，李伯谦先生以为可能早于M9、M13的M113、M114为晋国第二代国君晋侯燹父及其夫人墓。此外，李先生在附记中提到：主持M114发掘的孙庆伟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0期、李学勤在《文物》2001年第9期上先后撰文，均论证M114、M113组早于M9、M13组，M114、M113组之墓主人应为晋国第二代国君晋侯燹父及夫人。所以李孟存、李尚师两位先生的论断应当从改。见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3] 邱文选·晋国都七都六迁始末——兼谈古晋都故缘

- 在今襄汾. 晋阳学刊, 1982, (5): 103.
- [14] 李元庆. 三晋文化源流.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4~5.
- [15] 张德一. “故唐城遗址”与“唐叔虞封地”.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 (3): 41~43.
- [16] 乔志强. 山西通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47~48.
- [17]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历史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夏县东下冯, 附录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传说中的“夏墟”与夏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247~248.  
b. 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533.  
c. 杨国勇. 华夏文明研究: 山西上古史新探.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51~57.
- [18] a. 卫斯. 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 (2).  
b. 赵李娜. 叔虞封地再考——兼与王增斌先生商榷.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75~78.
- [19]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化局, 新乡地区文化局, 湖北省孝感地区博物馆. 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 文物, 1982, (7).
- [20] 李伯谦. 晋国始封地考略. 中国文物报, 1993-12-12.
- [21] 李伯谦. 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22] 邹衡. 论早期晋都. 文物, 1994, (1): 29~34.
- [23] 邹衡. 晋始封地考略. 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24] 邹衡. 晋始封地考略. 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15~221.
- [25] 邹衡. 晋国早期都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及其学术意义. 文物天地, 1998, (1): 27~28.
- [26] 刘绪. 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 三晋考古, 第一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27] 田建文. 晋国早期都邑探索. 三晋考古, 第一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27~29.
- [28] 徐天进. 晋侯墓地的发现及研究现状. 见: 上海博物馆编, 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527.
- [29] 谢尧亭. 北赵晋侯墓地初识. 文物季刊, 1998, (3): 70~71.
- [30] 陶正刚. 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 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364~368.
- [31] 王立新.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 中原文物, 2003, (1): 23~27.
- [32] 田建文. 初识唐文化.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总第二十一期. 2004: 14~15.
- [33] 王立新.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 中原文物, 2003, (1): 23~27.
- [34]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70, 272.
- [35] 孙诒让. 籀馆述林, 卷一·唐杜氏考. 1916年刊本.
- [36]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5.
- [37] 李学勤. 荡社、唐土与老牛坡遗址. 周秦文化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105~108.
- [38] 高明. 古文字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79. 引方法敛摹写, 白瑞华校. 甲骨卜辞七集, 68之“𠄎”.
- [39] 张永山. 卜辞中的唐与唐尧故地. 殷都学刊, 2000, (4): 14~16.
- [40] 郑杰祥. 商代地理概论.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292~293.
- [41] 沈建华. 甲骨文所见晋南方国考. 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05~206.
- [42] a. 田建文. 初识唐文化.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总第二十一期. 2004: 14~15.  
b. 田建文. 天上掉下晋文化. 文物世界, 2004, (2、3).
- [43] a. 田建文. 初识唐文化.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总第二十一期. 2004: 14~15.
- [44] 田建文.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考古学考察. 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327.
- [45] 清·陈厚耀. 春秋世族谱.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春秋类.
- [46] 2006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先生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参观, 面告笔者, 十分感谢. 此前葛英会教授曾参加2004年3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 亲睹“唐”、“先”共版的情况.
- [47] 温少峰, 袁庭栋. 殷代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 1985.
- [48] 唐晓峰. 甲骨文所见唐地史迹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历史地理, 第十八辑, 2002: 144~148.
- [49] 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九金石记一·商器.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地理类: 528~529.
- [50] 清·阮元.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常熟鲍氏后知不足斋本.
- [5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 文物, 1994, (8): 30~31.
- [52] 李学勤. 文王玉环考. 华学, 第1期.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 [5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25~126.
- [54] 李学勤. 文王玉环考. 华学, 第1期.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 [55] 江林昌. 晋侯墓地与夏墟、唐风、晋都. 光明日报, 1998-09-04.
- [56] 晋公盂最早著录于清代吴荣光所著《筠清馆金文》卷三, 器铭拓本以《三代吉金文存》18·13·3为好. 《两周金文辞大系》268亦可作参考. 器形见《商周彝器通考》475及《大系》图163.
- [57]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第八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230~231.
- [58] 北京大学文博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 文物, 2001, (8).
- [59] 李伯谦先生释“齋”为“齊”. 见李伯谦. 叔父方鼎考释. 文物, 2001, (8).  
王辉先生释为“爵”. 见王辉. 商周金文.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6.
- [60] 李学勤. 谈叔父方鼎及其他. 文物, 2001, (10).
- [61] 王辉. 商周金文.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6.
- [62] 朱凤瀚. 魏公簋与唐柏侯于晋. 考古, 2007, (3).

## 附录

非考古学者有关晋始封地观点一览表

历史时期 各家观点及出处	先秦时期	秦汉至南北朝	隋唐至宋元	明清时期	民国以来
大夏(夏虚)说	《左传》等				
居鄂说、鄂地说	《世本·居篇》	宋忠	司马贞		
晋阳说		班固等	陆德明等	顾祖禹等	范文澜等
河汾之东说		司马迁			
平阳说		皇甫谧	郑樵等		
永安说		臣瓚	颜师古		
翼城说			李泰、李吉甫等	顾炎武等	丁山、刘起钎等
夏县(安邑)说					童书业
永济说					马斗全
襄汾汾城说					邱文选
汾浍之交说					李元庆
南梁故城说					李孟存、李尚师
翼城、曲沃、闻喜一带说					乔志强主编 《山西通史》
晋阳、晋南两地并存说					张德一
平阳、翼城二者取一说					王玉哲等
天马-曲村遗址附近说					赵李娜等

(责任编辑: 李素婷)